

贊助對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與傳介之影響

徐菊清

此研究探討贊助行為如何操縱翻譯活動。文中以勒菲弗爾的翻譯文學贊助理論和翻譯如同改寫觀念為研究架構，來探究贊助對臺灣文學英譯發展的影響以及專業人士和贊助者如何從贊助的角色，參與和操控臺灣文學的翻譯活動。為此，本文首先溯源自1950年以來，臺灣文學翻譯的發展歷史和相關活動，以闡明有關當局與專業人士如何以贊助者的觀點，透過臺灣文學英譯，將臺灣推介到全世界。另外，再以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來探討贊助的角色及其對臺灣文學英譯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不僅證實贊助在臺灣文學英譯發展中確實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為此理論帶來另一視野，那是因為在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上，有些「專業人士」同時兼具「贊助者」的角色，以雙重或多重身份實際地參與、贊助和重寫臺灣文學翻譯的內涵及萬象，將臺灣英譯文學作為介紹臺灣並將臺灣推向世界的工具及方法，以凸顯臺灣特有的社會文化、地理環境、歷史背景和政治變遷等特色。經由贊助行為與活動，有關當局與專業人士不僅以臺灣文學翻譯來譯介臺灣，更將臺灣文學推向世界文學的舞台，以提高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關鍵詞：臺灣文學、贊助、文學翻譯、歷史發展、勒菲弗爾

收件：2012年9月17日；修改：2012年12月26日；接受：2013年1月9日

徐菊清，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Email: sunsterhsu@gmail.com。

本篇文章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贊助與翻譯：以臺灣文學英譯為例」（計畫編號為NSC 101-2410-H-231-013）的部分成果。

The Influence of Patronag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iwan's Literature

Chu-ching Hsu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ways in which translations of texts are manipulated by influential patrons. Using the framework of Lefevere's theoretical concept of patronage as a control factor i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idea of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atronage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of Taiwan's literature into English. More specifically, it seeks to show how certain professionals and patrons have manipulated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Taiwan's literature.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Taiwan's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1950's onward, to illuminate how the English renditions of this literature are used by certain authoritative figures who, acting in effect as patrons, have introduced Taiwan to the world. More generally, based on Lefevere's theory, it looks at the role of patronag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articular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onfirm that the patron indee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y also enrich Lefevere's theory of patronage in the syste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asmuch as some patron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s also serve to rewrite the original Taiwan's literature through their English renditions, which are consequently used to introduce and promote Taiwan to the world, for example by featuring its unique social culture,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patronizing translations, Taiwan is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through its literature, giving it greater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Keywords: Taiwan's literature, patronage,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efevere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12; Revised: December 26, 2012; Accepted: January 9, 2013

Chu-ching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sunsterhsu@gmail.com

壹、緒論

近半世紀來，由於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及社會政治的變遷及多樣化，不論國內外，愈來愈多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及分析文學翻譯；就敘述性翻譯研究來說，大多數的論文仍以討論特定作者或某作品及其譯文的詮釋與分析，但對贊助與翻譯之間的研究卻乏人問津。以臺灣文學外譯為例，至今大部份的論述著重於有那些英譯的出版品或臺灣文學在海外（如美國及歐洲）的翻譯情形（例如齊邦媛，1997；Heller, 2000；陳明台，2002；邱貴芬，2006；梁欣榮，2009）；雖有相關臺灣文學翻譯的研究，但卻僅限於少數在單一文本的研究（例如王儷蓉，2004；李育霖，2008，頁135-158；蔡易伶，2009），在探索贊助與翻譯的議題上或對相關翻譯贊助、選材、翻譯目的與影響的研究卻寥寥無幾；除了少數文章概略性地說明或敘述目前政府當局及非商業機構對臺灣文學外譯的贊助行動（文建會，2007，頁12-15；刁明芳，2008，頁131-144），和安必諾 (Angel Pino)（戎容譯，2006）特別針對臺灣文學外譯的情形，簡約地比較及分析臺灣文學翻譯至今在歐洲（德、法）及美國的歷史發展情況外，至今僅有邱雅瑜（2010）從參與選材翻譯或編譯的決策者之意識形態為主題，檢視兩大臺灣文學英譯計畫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英譯叢書系列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的文學觀 (poetics)；依其爬梳整理，邱的結論是「受到不同贊助者之意識型態與文學觀」的影響，且「兩方贊助者各自運用權力」，透過翻譯，重寫了臺灣文學的定義、內涵及文學意象，用以說明臺灣文學英譯，確實是受主事者意識形態的的左右，操控臺灣文學外譯（頁178-179）。

然而，「贊助的影響深遠，可決定文學系統的發展方式」（單德興，2009a，頁124），它不僅在翻譯過程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此方面的研究著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只是比較少有人關注；探究其

因由，如同王宏志所述：

有關翻譯的討論多只集中在譯文和譯者方面。這有其合理性：譯者是翻譯過程的操作者，而譯文則是翻譯過程的成果，受到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整個翻譯過程裏，其中一些極具影響的因素卻一直沒有的得到應有的注意，其中一個十分重要但卻往往被忽視的課題是「贊助人」的問題 (patronage)。(2001, 頁93)

在此議題上，本文特別要提出探討的是勒菲弗爾 (Lefevere) (1992) 的理論，他以眾多西方翻譯實例，說明贊助是影響翻譯過程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勒菲弗爾 (pp. 11-40) 指出，操控文學有三大因素，一是指當時社會文學系統本身的一些「專業人士 (the professionals)」，包括譯者、教師、批評家或評論家 (p. 14)；另一因素即是指在文學系統以外的「贊助人 (patronage)」。當一些作品與當時的文學觀或文學主流觀念 (poetics) 或社會意識形態 (ideology) 有所不同或背道而馳時，前者所指的「專業人士」可能會出面批評、攻擊、干涉或遏阻，促使這些作品進行改寫，甚至重寫，以符合或達到該社會所接受或認可的文學觀及意識形態。除了專業人士之外，贊助人則是另一個可能影響或操控某個作品重寫的意識形態；所謂的贊助人，可以是某些特定人士如宗教團體、政黨、出版商、或報章、雜誌、電台等傳播媒體人物或機構，他們重視文學中的意識形態更甚於當時社會的文學觀；簡言之，任何可能促進或妨礙文學閱讀或書寫，甚至可能導致重寫的力量或權力，皆可視為贊助人。通常，贊助人會和某一機構如教育及學術機構、評審或審查制度、或出版刊物等合作，與所謂的「專業人士」協調，出版符合某一時期的社會文化可接受的作品。

根據勒菲弗爾所言，贊助人掌控了三大要素：一是意識形態要素，那是指足以左右或影響作品內容或形式發展的意識形態；二是經濟要

素，指提供實質財務資金的贊助及資助（例如，以譯者翻譯薪酬、編譯或編輯稿費及出版書籍的印刷費用等等）；三是社會地位融合要素，例如上述的專業人士，除了接受實質的物質上的贊助外，更要能融入某一社會文化團體的生活及文化。這三種要素有時是統一或集中於同一贊助人 (undifferentiated patronage)，例如古代的王公貴族或現代的極權國家領袖或掌權者；反之，有時是分處於不同的單位或機構 (differentiated patronage)，例如經濟商業社會中的出版業者或以非營利為主的政府文化宣導組織或學術機構等。

然而，參與翻譯過程中相同的人其身份可能會因處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或團體而產生變化，可能無法如同勒菲弗爾理論中明白地將其區分為「專業人士」、「贊助者」並各司其職，以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為例，白立平（2004；Bai, 2009）的研究發現，在當時翻譯活動的進行是以教育或傳遞文化或知識為目標，故那時有些「專業人士」本身就是「贊助者」，有些更同時具有「譯者」、「審查人」等雙重或多重身份，在此情況下，贊助的影響，將不再是僅止於翻譯過程而是對於整個翻譯活動皆佔有著舉足輕重的決定因素；與此同時在對翻譯的操控上，「專業人士」與「贊助者」的關係可能不再是相互制衡或抵觸，而是相互合作，進而促進對翻譯活動的進行。

此外，影響或決定一件或一系列翻譯的產生，並不如邱雅瑜（2010）所定言的，因主導者（個人或少數群組）將會主導選書英譯的編輯委員的意識形態而全面決定單一翻譯叢書系列的作品特色，或著重於勒菲弗爾理論中特別討論的三個因素（意識形態、經濟及社會地位），其他因素如目地語「讀者」的接受度或市場的需要（楊衛英，2012，頁145），也會影響贊助者對翻譯選材的決定或「重寫」翻譯文學。另外，譯者的翻譯風格及採用策略是否為當時翻譯市場或讀者所能接受，這也是贊助者干預翻譯的表現之一，故贊助人的角色及其所掌握和控制的要素不容忽視。因此，要探討這方面的翻譯研究，則須全面性的開展及探索，非

一蹴可幾。

針對贊助議題，就臺灣文學外譯的過程和至今成果而論，臺灣文學英譯是一個很成功的文化外交的範例，因此就臺灣文學英譯而言，其歷史背景、原由、選材翻譯等因素極為重要，只是至今仍少有相關研究提出系統化的說明。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從國民政府遷臺後，經冷戰期間（1950/60年以後）迄今，以臺灣文化外交方面切入，深入探討以下主題：

- 贊助對臺灣文學英譯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及「贊助者」和「專業人士」如何透過臺灣文學英譯，以文化交流方式推銷臺灣，進而提高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能見度。

因此本文首先將有系統且詳盡地簡介臺灣文學英譯出版品至今的發展歷史過程，再從贊助議題與活動的角度，探究自1950/60年，越半世紀以來，相關出版書刊之肇因、目的與影響，深入探討贊助對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與影響；除了收集及運用已出版的相關資料和文獻外，並參考翻譯研究與文化理論加以觀照與應用，宏觀地深入探究有關於贊助對臺灣文學英譯的過程、發展歷史和執行成果及其影響。

貳、臺灣文學英譯發展簡史

就贊助與翻譯的議題上，臺灣文學外譯可視為一個很重要、很有意義、很有代表性及具有研究價值的議題。以文學翻譯為例，有關臺灣文學英譯作品推廣的歷史及發展可溯自1950年代後期，與美國文學中譯有顯著的關聯性，並根源於相同的中美文化外交關係。自1949年以降，隨著國民政府撤退遷臺，美國退還政府的庚子賠款的費用也輾轉來臺，之後中研院院長胡適運用了部份費用來贊助翻譯外國書籍；雖然在文學翻譯上，大部份是用於中譯英美文學，例如梁實秋將莎士比亞全集中譯（白立平，2001）。但事實上，美國文化事務處除了積極從事美國文

學中譯（單德興，2009a，頁117-158）之外，也從事少量的中書英譯的工作，例如在1948年協助出版由賽珍珠 (Pearl S. Buck) 翻譯的 *All Men Are Brothers (Shui Hu Chuan)* 《水滸傳》。¹到了1960年，中研院也開始協助當時在臺灣的中文作家之英譯文學作品出版，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由美國新聞處資助 Heritage Press 出版發行數本英譯的中文故事及詩集；²然而在英譯的小說或短篇故事中原作者有些並非永久定居臺灣，例如在 *New Chinese Stories: Twelve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1961) 一書中，所選的12篇故事中，僅有鍾正（鍾肇政）、及林枕客（林金楷／林今開）可視為臺灣本土作家，其餘的大部份原作者是長期居住在香港或旅居美國的中國人（包括張愛玲、吳魯芹、聶華伶等）。

與此同時，在1956/57年，齊邦媛因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換計畫 (The Fulbright Program) 到美國擔任訪問學者時，發現美國那時並沒有任何有關臺灣（文學）的英譯本可以介紹給西方讀者，以致無法代表臺灣發聲及促進臺美文化交流的機會（齊邦媛，2009，頁475-534）。到了1967年，當她再次赴美留學期間，應邀在印第安納州的聖瑪麗學院 (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 開設中國文學課程，在這段期間遍讀該校圖書館藏，卻沒有發現任何有關臺灣的資料，自此埋下了向國外推介臺灣文學的種子（齊邦媛，2009，頁377；單德興，2009b；2009c）。回國後，立即與殷張蘭熙 (Nancy Ing Chang) 共同戮力推動臺灣文學翻譯，並定期發表文獻於《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 刊物中。不

¹ Shi, N. A. (1948). *All men are brothers (Shui Hu Chuan 水滸傳)*. (Buck, P. S., Trans.). Taipei: Heritage Press.

² *New Chinese poetry* / translated by Yu Kwang-chung (1960); *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 / edited & translated by Nancy Ing Chang (1961); *New Chinese stories: twelve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 edited & translated by Lucian Wu (1961); *New Chinese writing* / edited and selected by Lucian Wu (1962); *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 /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Nieh Hua-ling (1962); *Spirit calling: five stories of Taiwan* / by Luch H. M. Chen (1962); *The purse and three other stories of Chinese life* / edited by Nieh Hua-ling (1962).

僅如此，當齊邦媛在1971年接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時更致力編譯中書英譯的計畫，使臺灣能在國外發聲。且於1973年起，由齊邦媛擔任主編，並邀請余光中、吳奚真、何欣、李達三 (John J. Deeney) 等共五人，共同編譯了一套三本中文英譯選集《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包括了詩、散文及短篇故事，並由國立編譯館出版；這一套書是不僅是「臺灣最早推展中書外譯的計畫」之成果，更是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中書外譯工程，那是因為此出版計畫從編審、翻譯到印刷，全部都是由臺灣卓越的人才在本地完成，而後才在1975年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合作於美國出版發行 (齊邦媛，2009，頁396-402)。在當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套文學選集成為美國大學中第一套源自臺灣的中國文學選集的教科書，同時也奠定了臺灣文學英譯的基礎 (刁明芳，2008，頁141-142)。

此外，特別針對臺灣地區，由當時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書的劉紹銘 (Joseph S. M. Lau) 主持編譯，於1976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這是在美國第一本以純臺灣文學為主題的文學選集 (應鳳凰，1997)。7年之後，又與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合作，於1983年出版了《香火相傳：1926年後的台灣小說》(*The Unbroken China: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這些選集中，收錄了多位臺灣本土作家及其作品，範圍更擴及臺灣日據時代的文選集，從戰前到戰後，包括了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 (*An Oxcart for Dowry*)、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 (*A Flower in the Rainy Night*)，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 (*My First Case*) 等多位在臺灣出生、長大及就學的本土作家。特別值的一提的是，其中作家王禎和自己也參與了其作品的——〈嫁妝一牛車〉 (*An Oxcart for Dowry*) 的英文翻譯工作。

另外，在美國由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為首編譯了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也在1978年，由美國的印第安納大學出版。而在詩集方面，有關臺灣詩集翻譯出版，則可溯自1970年，愛荷華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也首度出版中文詩集英譯 *Modern Chinese Poetry: 20 Poet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5-1965*，二年後，加州大學的榮之穎 (Angela C. Y. Jung Palandri) 也編譯了 *Modern Verse from Taiwan* 並於1972年出版。

幾乎同時，中文英譯風潮也吹進亞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翻譯期刊《譯叢》(*Renditions*) 自1975年第五期開始翻譯臺灣文學小品，包括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艷〉(*The Eternal Yin Hsueh-yen*) 及余光中的詩 (*The Poetry of Yu Kwang-chung*)，更於1977年第七期譯介臺灣本土文學作家黃春明的作品〈莎喲娜啦，再見〉(*Sayonara, Tsai Chien*)。之後，更陸續刊登翻譯臺灣文學作品於不同時間的期刊內。另外翻譯選集如 Soong & Minford 編譯的 *Trees on the Mountain: 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 也於198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內含有數篇臺灣作家英譯作品。

換句話說，自1970年之後，除了由國立編譯館發行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外，另由中華民國筆會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 於1972年秋天創刊的《中華民國筆會季刊》也有持續的發表臺灣文學英譯短篇小說、散文及詩等作品（至2011年秋季刊，已英譯臺灣作家作品1,944篇——小說460篇、散文388篇、詩作868首及藝術評介228篇）（梁欣榮、項人慧，2011，頁216），礙於篇幅長度的關係，長篇小說英譯的情況則相對的少了許多，這也是為何在1990年代前，少見長篇或單一作者的小說英譯出版原因之一，此亦是學者專家一直希望找到解決之道。直到1996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委託當時獲聘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諮詢委員王德威，邀請齊邦媛與瑞典漢學家馬悅然 (Malmqvist, N. G. D.) 等共同擔任編輯委員，籌畫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英譯系列，以譯介臺灣當代重要文學作品為主，將臺灣文學推向世界舞

台（齊邦媛，1997，頁81-84）。之後，從2000年起臺灣行政院文建會也參與贊助此出版計畫。

除了上述的篇幅長度問題之外，為何*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此系列叢書至今仍著重長篇小說，編委王德威進一步說明及解釋小說翻譯的重要性；在美國，長篇小說比較容易引起注意，這是為何先選擇將臺灣小說翻譯成英文出版的首要考量之一。此外，從贊助者的角度及目的，如何藉由小說來彰顯臺灣五十年來的文化命脈，使傳統與現代風格兼容並蓄，呈現臺灣多樣性的面貌，也是衡量的標準（張瓊芳，2000，頁6）；這也是為何*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選集系列執行中，先以小說英譯為主，試圖向世界展現臺灣文學與文化之美（刁明芳，2008，頁131）。

同一時期，1996年，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英譯工程亦在美國西岸展開，由隸屬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跨學科人文科學中心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發行了一年二期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在財務上，臺灣行政院文建會是此系列主要贊助者，相關的選稿、翻譯與出版皆由該中心負責，主要編選工作主持人是由杜國清擔任。除了上述兩大翻譯計畫外，美國東岸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也於1995年出版了由劉紹銘與漢學專家暨翻譯家葛浩文編譯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並於2001年針對臺灣詩文翻譯，出版了數本選集。在歐洲方面，德國馬漢茂 (Rosemary M. Haddon) 也於1996年編譯及出版英譯臺灣鄉土文學*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收錄呂赫若、楊逵、王禎和、黃春明等本土作家的英譯作品。

也就是說，自1990年代開始，不僅臺灣官方如文建會以經濟贊助者角色開始了「中書外譯計畫」，也在財務上贊助其他臺灣文學英譯的藝文活動，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臺灣行政院文建會數次參與贊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發行的出版費用。與此同時，一些非官方的（文教）基金會，先後也以贊助者的身份投入了相當可觀的費用，實質地贊助「中書

英譯」的工作。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除了上述原已進行的翻譯計畫仍持續不斷的進行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也繼續出版相關臺灣文學翻譯作品，例如針對詩集部份，由奚密 (Michelle Yeh) 與馬悅然編譯的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於2001年出版。不僅如此，政府單位除了早期行政院新聞局參與的《光華雜誌》、《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 及一些階段性或個人的專案計畫如國科會的「經典譯注」的執行外，現今的國立編譯館與文建會更積極且全力地長期參與贊助臺灣文學外譯（英、德、法、日等語言），更將企畫已久的「中書外譯」納入「國建計畫」中，同時，經建會更將臺灣文學翻譯視為國家發展計畫綱領的主要目標之一，以此方式將臺灣推向世界舞台（李喬，2001）。另外，國內出版社亦開始出版發行臺灣文學英譯，不僅早在1999年天下遠見出版了，由齊邦媛編譯的《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其它出版公司和（學術）機構也相繼發行一些臺灣文學英譯書籍，例如九歌已出版數本蔡文甫先生著作的譯文如《小飯店裡的故事》(*A Little Café*)、《船夫和猴子》(*The Free Man and the Monkey*)；此外，天下文化、書林出版公司、自由中央週報 (*Free Chinese Journal*) 等不同出版社都開始著手出版一些中書英譯文學作品，從不同的層面譯介臺灣。

參、臺灣文學英譯之贊助活動、方法和目的

由上所述，綜觀臺灣的文學翻譯活動之歷史過程，至今已超過半世紀；從贊助的時間和發展而言，可簡約地分成二個階段：從1950/60年至1980年代末期，可視為第一階段，自1990年以後可視第二階段。在前期，有關臺灣文學翻譯參與贊助情形，如勒菲弗爾 (1992, p. 14) 所述，以當時文學系統本身的一些「專業人士」，包括教師、譯者、評論家和編輯等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就參與經濟贊助行動的機構而言，除了在海外大學（如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單一作品翻譯及不同作家的作品選

集編譯外，在臺灣地區不僅有官方參與贊助，如國立編譯館出版的中文英譯選集《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更有民間發行的英文刊物如《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協助贊助英譯活動。後者自1972年秋天發行至今已有四十載，刊文遍佈全球超過120個國家，從不間斷地積極的推介臺灣文學；此季刊不僅可視為臺灣地區「最恆久努力將中文創作英譯」的刊物，更是長時間提供世界國際人士「瞭解臺灣社會、文化與文學」的主要核心傳播媒介之一（梁欣榮、項人慧，2011，頁216）。

在第一階段的贊助翻譯其目的是以譯介臺灣為主，故在翻譯選材內容，主要是以傳遞有關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文學及文本為題材，或是以當時較具有代表的作家或以當時的社會文化為主題和內容的文學作品為主要翻譯對象，其中包括書寫當時臺灣社會生活、文化意識的文學作品或以居住在臺灣的作家之作品為主。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文學觀和政治意識形態，在1980年代中期前，臺灣民主自由可視為是華人地區的「自由中國」，那時在臺灣地區的社會政治文化意識認為「臺灣就是中國」，因此要藉由翻譯，推廣國家文化，讓外國人知道臺灣當地有很好的文學作品；所以當時在臺灣地區參與翻譯選材者，除了參與翻譯或編譯的「專業人士」外，當地的語文教育專家也會參與，選出當時在臺灣地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作品（單德興，2012，頁256-258）。至於在海外，如應鳳凰（1997，頁85）所言，就美國出版臺灣文學翻譯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用途，許多學者將臺灣文學英譯，再以文學選集方式出版，作為外國學生學習二十世紀後期中國文學和語言的教材，以彌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文藝作品的短缺；因此，在那段時期，特別是論及二十世紀後期的中國文學時，臺灣出版的華文文學，可視為中國文學脈絡的延伸。

換言之，因為特有的文化交流動機及教育目的，再加上政治、經濟、外交等多項因素，在1990年以前，臺灣文學翻譯的主要經濟贊助者不僅是以教育機構、官方文教組織或非商業營利為主的基金會為主要對

象，同時許多「專業人士」本身亦具有「贊助者」的雙重身份，他們既是代表經濟贊助的一方，同時也扮演著選材者、譯者、評論家和譯文審查者的雙重或多重角色，長期地贊助參與臺灣文學英譯的活動（例如齊邦媛當時即是國立編譯館人文科主任，亦從事翻譯工作，更是參與翻譯選材及編審譯文的決策者，其他如殷張蘭熙也是《中華民國筆會季刊》主要譯者、主編，更是出資印行者，其他參與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如林語堂、余光中、李達三、葛浩文等也同時身兼多職）。這些「專業人士」廣納國內外不同群組的專業意見或喜好，加以比較，再選擇具有代表臺灣的作家之作品或是書寫臺灣的文學作品為主要文本選材，進行翻譯活動，以達到宣導臺灣（文學）為主要目的。雖然礙於經濟因素，當時的選材以小篇幅的詩、散文和短篇故事為主，並以選集方式翻譯出版，或是透過定期出版的翻譯季刊，譯介臺灣。然而這些「專業人士」，幾乎同時扮演著教育者、譯者、編輯和評論者的多重角色，試圖以個人或小群組的贊助身份，孤軍奮戰地進行翻譯活動，默默地為當時的社會翻譯過程而努力。他們翻譯的動機，「是藝術的喜悅，而不是政治、經濟或社會的使命感」（齊邦媛，1998，頁145）。若有特殊目標，長期支撐著翻譯活動的進行，仍以介紹和推廣臺灣為主要目的，如同齊邦媛中譯當時擔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的林語堂在1972年《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的創刊首頁序言：³

多年來我們一直想出版這樣一本刊物，向國際上介紹我們在台灣的文學創作，因為西方世界對台灣的過去和現在所知太少，他們幾乎完成不知道台灣不斷產生新的文學作家，他們的作品可能為我們開啟了解和交流之門。在今日世界，東方與西方必須相牽相逢。希望這份季刊是一座引各相逢之橋。（齊邦媛，1998，頁146-7；2004，頁182）

承上所述，此刊物是以譯介「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 在

臺灣繼續成長茁壯的文學成果，為世界其它地方的讀者開啟一扇了解中華民國臺灣的生活和思想之門。

然而，在1990年以後，臺灣文學翻譯邁入了另一個階段，由於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變遷，特別是當時論及「臺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的議題時 (Wei, 2006; Simpson, 2007, pp. 246-259)，兩地不同的語言文化、社會地理、歷史背景等意識形態崛起，描述有關臺灣特有的語言、政治、社會、人民生活的文學著作，通常是此階段能否入選為代表臺灣文學外譯題材的條件之一。此外，為了提升臺灣在世界的能見度，讓西方的讀者了解臺灣特有的文化，並與西方文學世界接軌，以英譯漢字文本書籍方式，翻譯臺灣的語言文字，進行文藝交流，因此贊助文學翻譯活動已成為必要之舉。除了原有的（文教）基金會及學術教育機構繼續贊助中文外譯的活動外，有關政府當局也著重參與翻譯文學計畫，在財務上，實質地投入了更為龐大的外譯計畫及贊助規模，以優渥的翻譯稿費廣邀海內外學者專家參與，有系統地將特有的臺灣文學英譯及外譯給

³ 英文原文如下：

It was not until the hosting of the Third Asia Writers' Conference in Taipei in 1970 that this hope gathered momentum, spurred on by the feeling of having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introducing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r so. All the more it was realized how little the western would know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is still going on, here in Taiwan. That there is a constant sprouting up of new talents whose work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outside world. Even if some of these works may not become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at least they have their importance in opening up a door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thoughts of the people he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is aim in mind, our Chinese P.E.N. Center has finally surmounted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We have collected som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ogether with members who willingly contribute of their time and energies, we come out with this first issue of our long hoped for quarterly.

It is our hope that in the issues to come, we can present to our counterparts all over the world, a picture of what is being produced here by our present generation of writers. We hope to introduce some of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literary field: essays, fiction, poetry, criticism.

Today the East and West must meet. May this quarterly be a bridge towards such a meeting.

其他在世界各地的讀者，經由譯介及推廣加深對臺灣的印象，使臺灣能見度更加寬廣。

肆、贊助與臺灣文學英譯發展和影響

就臺灣文學英譯發展歷程與贊助翻譯活動而言，不論是在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專業人士」一直扮演著一個很重要且關鍵的贊助角色，他們一方面須自行找尋經濟財力支援，另一方面卻握著翻譯選材的權力，並且親自從事勞心又勞力的翻譯和編審譯文等工作。先就文學觀和意識形態而言，他們藉由掌控選擇「翻譯題材」的權力，對所謂的「華文文學」或「臺灣文學」進行「文學名聲」(Literary Fame) 的操控。以臺灣文學英譯出版品中，至今最有名且廣為人知的二大出版計畫——*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和《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為例，二者皆始於1996年，不僅廣邀國內外名家參與翻譯，更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合作出版，他們因此成為西方讀者了解臺灣文學、文化、歷史、思想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管道之一，其成效之大，不僅是將臺灣文學介紹給西方讀者，更將臺灣獨特的歷史、民族風情、地理與政治文化帶上國際文藝舞台。然而入選精譯於此二大系列的內容及選材，卻因「專業人士」和「贊助者」所欲表達的文學意識形態或呈現的文學名聲有所差異，「刊物名稱」及「選材翻譯」則成為他們可以進行操控權力或表現其文學意識的首要呈現處。

首先就以中文刊物譯名為例，此*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系列的英文名稱自1996開始至今一直維持不變，但有趣的是在其中文譯名，於不同的文獻中卻有不同的名稱，更有可能因不同的時空背景和出版刊物，而出現不同的中文譯名，例如主編之一齊邦媛將其中譯為「台灣現代華語文學」（2009，頁522）或稱為「台灣文學系列」（2004，頁222），另外刁明芳（2008，頁131）在此書《國際漢學的推手——蔣經國基金會的故事》譯為「台灣現代小說英譯選集」，而《台灣光華雜

誌》將此系列譯成「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張瓊方，2000），如此多樣但不同的譯名，除了因二十世紀末臺灣本土意識崛起，將「臺灣文學」獨立成一學派，不再是中國文學的另一分支。再加上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邁入本世紀後，當今都已選用「臺灣文學」為譯名。但是回溯到1987年解嚴前（1980年代末期），在臺灣的政治地理意識並沒有將臺灣視為「一個獨立的區域 (region) 來想」，因為那時候的政治地理觀念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政治和社會意識是延續中國語言及文字，較少論及本土或臺獨（單德興，2012，頁258-259）。而且，本系列叢書，可視為是1975年由國立編譯館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延伸，再加上初始財務贊助者是蔣經國基金會，它的宗旨⁴是——「在以嚴謹的學術立場，獎勵支持世界各國學術機構與學者對中華文化之研究，並促進國內外之學術機構進行交流合作。期望藉而使國際間對我國之社會文化有更充份的瞭解」。

也說是說，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的研究著重在有關「中華文化」的發展，全世界所有與中華文化有關的人、事、地、物皆可涵括於內，當然也包括中華民國臺灣。因此只要是與臺灣有關或在臺灣產生的文學，即可納入此系列，加以選譯，如此的贊助意識當然可以接受此系列的英文抬頭，其入選翻譯的文本題材也反映出此文學觀。*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以中文直接翻譯的意思可譯為「來自臺灣的現代中國文學」，但為了區隔海峽彼岸中國大陸的中國文學，而以中華民國自稱的臺灣，一向以「華文文學」或「華文」來命名。故此系列選材以在臺灣出版的「華文文學」為主，並不侷限於作家的（原）出生地，只要作品內容是描述有關臺灣特有的語言或社會，舉凡是有關臺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類型的多元化的文學，都有代表作品入選，例如1977年以後的新現代文學作家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蕭麗紅

⁴ 此宗旨可參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基金會簡介：<http://www.cckf.org.tw/introduce.htm>。

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等鄉土文學或本土小說中呈現當時臺灣農村經濟、社會危機、價值觀念等元素；另外也包括1980年代的多元文學如鄭清文的《三腳馬》、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李喬的《寒夜》、張大春的《野孩子》、朱天心《古都》和齊邦媛、王德威編譯的《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等描述臺灣的政治文學、眷村文學、離散文學等，以凸顯從日治時代到現今臺灣地區的政治、地區開發、歷史事件、教育、國家認同等議題。另外女性主義作家及作品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和臺灣後現代文學中，張系國的《城三部曲：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結合中國歷史俠義和科幻等多樣化美學，也都入選翻譯。不僅如此，英譯《台灣原住民文學》更在2005年出版，另外與臺灣有關的馬華文學，如來自馬來西亞但居住在臺灣的李永平之《吉陵春秋》和張貴興的《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也都入選並包括在此系列中。這些不同類型的文學，也是西文漢學學者、評論家及讀者關切之處，例如後二本書的原作者（李永平和張貴興）的馬華身份總是書評或譯本介紹首要強調重點之處 (Quan, 2003, p. 124; Chipman, 2007, p. 24)。如此多樣的文學類型，也是顯示至今臺灣地區多元的社會和文化，透過不同的文學題材及內容譯介臺灣文學或在書寫有關臺灣的文學。

相較之下，《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自1996年創刊以來，每期的刊物封面上則明確以中英雙語呈現，內容是以「臺灣文學」英譯為主，不同於前者的英譯選集系列以單本單書翻譯及獨立出版方式，此期刊是以一年二期，以學術專刊方式出版，每期英譯內容除了短篇小說、散文、詩句外，並包括評論性文章及研究論文，即時地提供英文讀者有關臺灣文學的發展及研究動向，此文學觀已明確地在每期叢刊的書背封面上說明出版的目的是：其宗旨⁵是：

⁵ 此叢刊宗旨也可參閱<http://www.eastasian.ucsb.edu/projects/fswlc/tlsd/research/journalindex.html>。

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亦即台灣本地的作家和研究者對台灣文學本身的看法，介紹給英語的讀者，以期促進國際間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和動向能有比較確實的認識，進而加強從國際的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

最重要的是選材翻譯是依每期刊物主題而定，至今已出版的多元化的臺灣文學作品包括「新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國際視野」、「台灣原住民文學」、「台灣本土文學」、「台灣女性文學」、「台灣兒童文學」等等，更有針對單一作家及時期以專刊英譯發行，如「賴和、吳濁流與台灣文學」、「葉石濤專輯」、「台灣文學與二二八」、「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等等至今共30個主題專刊。此專刊是由杜國清和Robert Backus共同擔任主編，但每期的主題訂定主要由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跨學科人文科學中心所屬的「世華文學研究中心」負責選稿，再請美國學術專家進行相關的翻譯工作，最後由杜國清編輯、修訂和出版（杜國清、邱貴芬，2010，頁114）。杜國清會在每期前言說明該期主題因由及入選作品原因，以協助讀者透過不同主題進一步了解臺灣人文、地理、歷史、社會文化、民俗風情等多元化及多重因素造成現今臺灣特有的多樣特色。例如，基於贊助因素，一些在美國的臺灣人於2003年以實質地財務捐獻（美金五十萬）贊助該中心的臺灣研究，故2004年該刊第15期的「賴和、吳濁流與台灣文學」的前言中，杜國清說明此專輯選材英譯原由：

這七八年來，我們出版《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一些熱心台美人士的肯定，而於去年慷慨捐贈，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設立了永久性的「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以推動美國學術界與國際間有關台灣的研究為宗旨。校方並於今年(2004)四月正式任命杜國清教授為該校講座的第一任講座教授。這在美國學術界是首創，意義

重大，因此本集的主題，特地譯介給用以命名這個講座的兩位傑出的台灣作家和文化人物，以示尊崇。(2004：ix)

換句話說，將臺灣文學透過英譯介紹給西方讀者，同時也是將臺灣推向國際舞台，使臺灣的作家及其文學作品及種種有關傳播臺灣特有的文化、社會、地理、歷史、文藝、政治等活動，利用翻譯，提升臺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其中，從贊助的議題來說，最大的及最重要的推手除了「專業人士」本身贊助外，政府（文建會）與非營利為主的文教基金會（例如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浩然基金會、林伯奏基金會及海外台裔所成立的基金會等）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在財務上資助翻譯，同時與國際聞名的學者專家合作，將臺灣文學英譯，再與國際著名學術機構合作出版，藉由學術和教育的影響，推介臺灣特有的文學和社會文化，以文化交流的軟實力，提高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換言之，藉由贊助出版臺灣文學英譯的行為，促使臺灣當地特有的作家及文學作品，從中國大陸地區的中國文學區別出來，走出另一個獨特的「台灣文學」道路；此行動就如同邱雅瑜所言：「透過翻譯，台灣文學得以站上國際舞台，受到國際矚目」（2010，頁2）。

就贊助翻譯活動而言，二十世紀末及二十一世紀初，是臺灣文學外譯最鼎盛的時期，不論國內外，愈來愈多的贊助者參與了臺灣文學英譯。在國內方面，為了將臺灣推向世界舞台，使臺灣能見度增加，行政院文建會自1990年起，進行第一階段十年的「中書英譯」計劃，不僅贊助英譯文學的出版，更涵蓋了多項藝文活動如戲劇、美術、音樂等文化翻譯工作。而且翻譯的語言，並不侷限於英文，兼有法文、日文、德文、西文、俄文等八種不同的語言。自2000年起，繼續進行執行第二階段的「中書外譯計畫」，也同時贊助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正在執行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選集及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及「台灣作家英譯系列」（文建會，2007，

頁12)。

除了官方機構及非官方組織在實質上提供經濟財務的贊助與涉入翻譯的「專業人士」如選材審查者、譯者、評論者、譯文審查者、編輯進行語文轉換的實質翻譯活動的行為贊助外，如何將譯文實體化，以西文傳播到其他世界的讀者，另一贊助者——出版單位，則扮演一個非比尋常的角色。就臺灣文學翻譯出版而言，如上所述，分國內外二方向同時進行，第一階段早期，國外方面除了少數在美國個別學者編譯以單冊出版外，以及經由香港中文大學以期刊及編輯華文文學出刊；而在國內方面，國立編譯館可以是那時有實際參與及推動翻譯計畫，冀望藉由翻譯國內很好的文學，以文化交流方式，引介臺灣給國外讀者，讓西方人能進一步對臺灣有更深入的了解及認識。當時出版的動機是以譯介臺灣為目的，結合國內外許多學者兼譯者共同參與選材、翻譯及審閱，譯作內容以「當時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著作為主，除了在國內外出版《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外，更將未收錄出版的譯文轉贈提供給民間的英文期刊《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出版，向國際介紹臺灣的文創，意在開啟外國對臺灣的了解，進行長期深耕的文化交流。

但在第二階段1990年以後，除了《中華民國筆會季刊》不間斷的譯介臺灣外，外譯臺灣的工作則以國外為主力，與國際知名的學術機構及出版社合作，有系統地出版專業中文英譯文學作品，以學術及教育界讀者為主要對象，達到文化傳遞的目的，透過閱讀英文譯作，使西方讀者了解臺灣特有的文學語言、文化、地理位置及政經發展情形。因此，不同時間的臺灣文學及發展特色，皆有其代表文學作品入選英譯，介紹給歐美及其他外域的英文讀者。雖然出版單一叢書和期刊的方式不同，二者的宗旨和選材也不甚相同，但是譯介臺灣並促進國際間對臺灣文學的重視與研究卻是所有英譯出版發行的主要目標。

至於為何與大學出版社合作，除了以「學術價值」的角度來決定出版與否外，大學出版社所關心的「西方讀者的接受度」是考量的原因

之一（齊邦媛，1998，頁292）。此外，經由此途徑所出版的發行數量也很龐大，其通路更可遍及歐美及全球各地，包括各地的學術機構和當地公共圖書館，影響所及，不只僅限於教育目的，更能促使國外讀者認識臺灣，藉此提升並推廣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單德興，2012，頁258；Quan, 2001）。以此跨國出版方式合作贊助翻譯，也受到國策顧問李喬支持，並就「中書外譯」的方向，對國家所提出的建言，其指出：「政府應透過民間機構，有計畫成套外譯當代文學作品」，並實質地在經濟上贊助，聘定著名譯者，同時進行翻譯，並和「在外國與相關學校或學術團體領銜出版，一起宣傳推廣」（2001，頁10-11）。現今，除了與國外學術出版單位合作外，在國內方面，無論官方或非官方組織，也會贊助有關的英文翻譯刊物的出版（例如，經濟贊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和補助國內學術機構及國家文學館出版英文（及其它語言）或中英對應的專刊、書籍等有關臺灣文學翻譯與研究（李林坡，2012），使國內外對臺灣有興趣的學者及讀者，容易取得有關臺灣文學的翻譯及研究資訊。

不可否認地，文學作品中展現的普世議題或世事人情，或許沒有疆界，但是如何透過另一種不同語言及文字來呈現原故事中欲表達之意，這與贊助者和參與決定那些書籍及選材翻譯成另一種語文皆是很重要的議題。這些獲選精譯的故事，通常編輯委員會將每本書入選英譯的因由，明確地在英譯本前言敘述說明，主要因由及出版目標皆冀望透過每一選集能使任何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可以真正深切了解臺灣人的真實面及聽到臺灣在地民眾的心聲。此外，編選委員的個人推薦也可能影響翻譯選材的入選，例如齊邦媛在英譯本前言明確陳述，《千江有水千江月》是其最想推薦翻譯給西方讀者的書籍之一，書中特有的單純愛情故事和家庭關係的描寫，無論哪種年齡層的讀者，都會對臺灣風土民情有所了解（Chi, 2000, pp. VII-XI）。另外，已在海外獲獎及受到矚目的創作，也是入選英譯代表臺灣文學的原因之一，前者包括鄭清文在1999年獲美國

「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Kiriya Pacific Rim Book Prize)的《三腳馬》，它是首次獲得國際文學大獎的臺灣文學作品(Chua, 2012)；後者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1946年它首次在臺灣以日文《胡太明》問世，並於1957年在日本出版，到了1962年才有中譯版本的發行，在1973年中譯版則改名為《亞細亞的孤兒》，一直到2006年，英譯才在本系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由日文直譯成英文上市。

除此之外，針對選材議題上，從贊助的角度，彭鏡禧提出對翻譯書籍及內容的選擇應注意之處：

翻譯的取材難免會反應取材者的主觀偏見，因此編審閱讀的廣度很重要。重要報紙的副刊、各種文學刊物、各項文學獎項得獎作品、年度文學作品選集等等，都是必須隨時注意的。(彭鏡禧，1999，頁90)

也就是說，既然出版品是以臺灣地區為首要考量，其中文原著在臺灣文學界的地位、體裁內容、獲選或獲獎意義等因素皆應納入考量，最重要的是，它是否能真正具有代表性。在此議題上，如何從已得獎的廣大作品中，再加以選材英譯，也是編審必須面對的另一難題，以《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此書剛出版時，當時作家兼文學評論家龍應台對此作品給予相當負面的回應，龍應台認為該書結構平淡、笑話誇大，特別對小說中的黃腔黃調極為反感(1985，頁77-82)；反之，對本書有正面評價也不在少數，例如王德威則對此書極為贊許(1985，頁237-239)，再加上譯者兼美國市場讀者葛浩文(Wang, 1984/1998)對此書中描述臺灣當地特有政治和社會語言文化給予很高的評價，主動自願翻譯此書，因此在中文原著出版12年後，譯介給英文讀者，結果市場讀者和書評家都給予相當正面的反應(Berry, 2002)。除此之外，其他譯作如朱天心的《荒人手記》在美國各大報紙得到很高的評價，視為了不起的文學作品(林麗君、葛浩文、吳叡文，2010，頁148)；另外，《亞細亞的孤

兒》、《野孩子》、《古都》的書評也和《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評論者有相同的看法，同意英譯文本確實可以協助或促使一般大眾英文讀者，認識傳統中國和臺灣文化，更可以了解20世紀後期的臺灣文學 (Lin, 2001; Sciban, 2003; Or, 2005; Williams, 2000)。

誠如勒菲弗爾在其書中指出，有關「文學名聲」的操控中，（學術）教育機構可視為是最重要的單位，因為它通常包括了「專業人士」和「贊助者」(1992, pp. 15-25)。透過選材或編輯，專業人士可重新書寫文學史，佐以建立或配合一個贊助者可接受或欲建立的文學社會的意識形態及文學觀，甚至是形成或達成某一特定的「文學經典 (Literary canons)」。同時或隨後，經由（學術）教育機構，將此「經典」宣揚或傳播出去，以形成一個完整及有系統的文學體系。然而，是否單就贊助者的操縱行為就足以影響翻譯成果，或許並不僅限於勒菲弗爾理論中所討論的三個因素（意識形態、經濟及社會地位），或如邱雅瑜（2010）定言因主導者的（個人或少數群組）的意識形態而全面決定單一翻譯叢書系列的作品特色。事實上，以臺灣文學英譯發展中，除了參與翻譯和編審的專業人士「人力」贊助和企業組織在實質財務經濟上的「錢力」贊助外，目的地「讀者」也可視為影響贊助或選材「權力」的變因，因此並非完全由專業人士獨斷地就能決定翻譯文本。在此議題上，張大春也提出其看法和論述，其指出：

《我妹妹》、《野孩子》並非他的代表作，選擇這兩本書翻譯成英文，主要是題材、內容的考量，因為其他作品有特殊的中國或台灣事件、背景，不是那麼容易翻譯，美國讀者也比較不容易接受。（引自張瓊芳，2000，頁6）

在這方面，和齊邦媛也進一步確認，以譯介小說為例，選擇的作品常常並非該作家的代表作品，主要是以目的語的讀者的接受度為考量 (ibid.)。因此，出版商在臺灣文學英譯的角色，不僅具有贊助翻譯出版

及決定出版銷售與否的「權力」，更扮演著讀者的角色或代表人，檢視著選材、翻譯內容和譯文的接受度。也就是說，出版商可能在經濟上協助譯者，更有可能是是在譯文完成前後以贊助者身份或代表讀者角色來干預翻譯的活動。換句話說，雖然「專業人士」或「贊助者」會是影響翻譯本文選擇的原因之一，但是目的地「讀者」在選材翻譯的過程中，也扮演著不容忽略的重要角色，並非任由專業人士獨斷地決定翻譯文本。在這方面上，譯入語讀者與贊助者之間的權力與權限是值得另闢專題，加以深究及評判的。

根據勒菲弗爾（1992, p. 18）所提的理論，贊助者為譯者提供經濟上的保障，使譯者接受贊助者所提出的指令，並促使譯者服從贊助者的地位和權威，特別是當二者有衝突時，譯者通常會調整腳步或對贊助者讓步。然而就此論點而言，經由本研究的探討發現，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過程似乎是有別於勒菲弗爾所提出的論點，那是因為涉入臺灣文學英譯的「專業人士」大部份同時具有「贊助者」的雙重身份，所以他們有時會提出反駁，並將其個人或族群意識強加入選材中，但是為了迎合目的語讀者的興趣或因應出版預算的經濟考量，他們也可能藉由編譯或改寫原著方式，將他們所認同的臺灣文學意象刪譯給英語世界的讀者。例如李喬的《寒夜》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英譯本，充其量只能算是節譯或刪譯，前者是由原本的三冊，刪除了第二冊，並將其它二冊節選為一冊，再加以翻譯；後者的中文原著有700多頁，然而最終僅編譯成300多頁的英文出版品。如此大幅度的刪譯，雖經原作者同意或檢閱，卻仍是英文書評者提出質疑的問題之所在 (Kinkley, 2006; Quan, 2005; Zaleski & Steinberg, 2001)。然而，是否應該精譯原文，或是受出版篇幅限制而刪譯或節譯，是值得探究因由，至於如何尋求箇中平衡點，則取決於編輯與出版社的溝通與協調結果。不過，在翻譯過程中的處理細節，則是「專業人士」與「贊助者」共同「重寫」(rewrite) 翻譯文學的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手法及議題。

另外一點，在勒菲弗爾的論點中，「贊助者」是被視為是「文學系統以外」的控制因素，也是對翻譯文學產生影響的重要「外在」因素（1992, p. 14），但是臺灣文學英譯歷程中，文學系統「以內」的專業人士，許多兼具有「贊助者」的角色與功能，與翻譯有著緊密的關係，更是支配及影響傳遞臺灣文化萬象的主要助力及推手，實質地在「文學系統內」扮演著一個操控的角色。那是因為在臺灣文學英譯活動的歷史過程中，如同安必諾觀察後所提出的評論，臺灣文學外譯的事實，「往往是台灣人自己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他們或直接投入評論研究、作品翻譯——如在美國、在英譯界——或間接通過官方機構，以津貼相助。」（戎容譯，2006，頁164）。也就是說，贊助參與出版臺灣文學英譯的主要方法、過程與執行，是由在國內外的臺灣「專業人士」自己提出構思，再向政府及基金會尋求資助，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專業人士」本身也充當「贊助人」（如任期於政府及學術機構或基金會資助者），更有「專業人士」同時具有譯者、選材者、譯文審查人、評論者和編輯等多重身份。如此多樣的角色，對翻譯內容、選材、發展可能和其他研究或理論產生不同的結果。不可否認地，翻譯的主體還是譯者，但以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與過程而言，「贊助」行為並不完全如勒菲弗爾所言，是文學系統以外的「外來因素」，「贊助者」或「專業人士」都可以視為是臺灣文學翻譯的主體之一，而且「外來因素」與「翻譯主體」合而為一，共同「贊助」翻譯活動，並將英譯的臺灣文學當成介紹臺灣並將臺灣推向世界的工具及方法，以凸顯臺灣特有的社會文化、地理環境、歷史背景和政治變遷等特色，並促使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學上，占有一席之地。

伍、結論

為了探討贊助與翻譯的關係與影響，本研究以臺灣文學英譯發展歷史及相關的英譯書籍、刊物背後參與贊助活動對象為研究主題，深入探

索自1950/60年後以臺灣為中心的文學作品其英譯發展歷史、原因、贊助者的動機及目的，藉由檢視及探討贊助者及專業人士如何透過翻譯活動，對臺灣文學英譯進行不同程度的掌控，以符合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文學觀及贊助者所期望達到的文學經典和參與臺灣文學英譯活動的目的。

不可否認，就贊助的議題而言，如同勒菲弗爾所述，贊助者（與專業人士）確實可從三大方面參與文學翻譯或改寫活動的進行。首先在意識形態要素上，贊助者和專業人士對翻譯出版書籍內容和形式，會有意識的進行相當的干預，以達到其預設的文學觀或所謂的「文學經典」。第二是在經濟要素方面，不論是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機構，實質的財務贊助是外譯活動持續進行的幕後功臣之一，若沒有這些大額度的財源來支付專業級的翻譯薪酬及印刷出版費用，即使專業人士空有想法及計畫，也無法促使大規模的翻譯工程計畫付諸行動和持續發展。此外，贊助人掌控的第三大要素——社會地位融合，也確實會影響贊助翻譯活動的進行，其中最顯著的選材精譯過程與進行，可為此因素的體現，例如一件原已預計實施的翻譯計畫，可能因主事者的變遷，因社會地位或處事方式無法和參與此計畫的相關人員相融合或接受時，計畫有可能招致延宕或無法執行。

簡言之，翻譯活動、過程和成果並不僅與譯者有關，更是與贊助人息息相關，深受其影響與操控。贊助與翻譯的關係，如同勒菲弗爾所言，贊助者對翻譯作品的操控是與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然而，有別於勒菲弗爾在西方翻譯過程中所觀察得到與贊助活動有關的論點，在臺灣文學英譯過程中，有一個特別值得提出關注的現象，那就是文學系統以外的「贊助者」本身就是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或是「譯者」本身兼為「專業人士」及「贊助者」的角色，這些集雙重或多重角色於一身的「專業人士」都實際地參與贊助「臺灣文學英譯」中所有或部分過程，包括選材、翻譯、審查譯文、評論、編輯

等相關翻譯活動。如此具有雙重或多重身份的「贊助者」和「專業人士」，是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更對勒菲弗爾的理論可以有進一步的闡明或多所補充。

經由上述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歷史說明，並針對有關臺灣中書英譯計畫，詳細深入分析探索相關出版事宜、贊助單位及主事者的資料與相關文獻，爬梳有關臺灣文學英譯發展與贊助行為及影響，特別是，臺灣文學英譯的歷史發展及影響在贊助與翻譯的議題上有了不同的體現。透過此論文，我們可以了解到，翻譯活動和研究不應僅侷限於譯者，其背後擁有強大人力、物力、財力和權力的「贊助者」和「專業人士」，在翻譯活動中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具有不容忽略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 刁明芳（編）（2008）。國際漢學的推手——蔣經國基金會的故事。臺北市：天下文化。
- 王宏志（2001）。權力與翻譯：晚清翻譯活動贊助人的考察。中外文學，30（7），93-127。
- 王德威（1985）。考蒂莉亞公主傳奇。龍應台評小說（頁215-242）。臺北市：爾雅。
- 文建會（2007年6月）。一方一方文字磚打破語言籬籬中書外譯計畫：打造台灣創作版圖。新台風，11，12-15。
- 王儷蓉（2004）。台灣鄉土小說翻譯——論黃春明與王禎和作品之可譯性及其英譯之等效問題（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 白立平（2001）。「贊助」與翻譯：胡適對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的影響。中外文學，30（7），159-175。
- 白立平（2004）。詩學、意識形態及贊助人與翻譯：梁實秋翻譯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 戎容（譯）（2006）。安必諾 (Angel Pino) 著。台灣文學在德、美、法三國：歷史及現狀一瞥。中外文學，34（10），155-165。
- 李林坡（2012）。台灣文學外譯書目提要 1990-2011 (*Bibliographical synopses of translated Taiwan Literature, 1990-2011*)。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
- 李育霖（2008）。翻譯與地方文學生產——以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翻譯闕境——主體、倫理、美學（頁135-158）。臺北市：書林。
- 李喬（2001）。臺灣文學的發展。文學臺灣，39，6-12。
- 杜國清（2004）。卷頭語：賴和、吳濁流與台灣文學。台灣文學英譯叢

刊，15，ix。

杜國清、邱貴芬（2010）。推窗望月：台灣文學研究的「國際化」。載於陳明柔（主編），**推窗望月：台灣文學國際鼎談**（107-138頁）。臺中市：晨星。

邱貴芬（2006）。台灣文學中書外譯現況概述。**台灣文學年鑑**（頁140-144）。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邱雅瑜（2010）。從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看台灣文學之英譯（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北縣。

林麗君、葛浩文、吳叡文（2010）。困境·危機·轉機——台灣文學研究在國際。載於陳明柔（主編），**推窗望月：台灣文學國際鼎談**（139-170頁）。臺中市：晨星。

陳明台（2002）。在美國紮根——杜國清與《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台灣文學年鑑**（頁137-138）。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梁欣榮（2009）。台灣文學中書外譯現況概述。**台灣文學年鑑**（頁155-158）。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梁欣榮、項人慧（2011）。打開台灣文學的世界視窗：中國民國筆會。**編譯論叢**，4（2），215-218。

彭鏡禧（1999）。中書外譯回顧。**台灣文學年鑑**（頁88-90）。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張瓊芳（2000年12月）。台灣文學「放洋」記。**台灣光華雜誌**。取自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show_issue.php?id=2000128912006c.txt&table=0&cur_page=2&distype=

單德興（2009a）。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翻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

單德興（2009b年7月7日）。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上。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7/today-article1.htm>

單德興（2009c年7月8日）。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下。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8/today-article1.htm>

單德興（2012）。齊邦媛教授訪談：翻譯面面觀。編譯論叢，5（1），247-272。

楊衛英（2012）。從意識形態的變遷看經典譯介背後的操縱力量。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8），145-147。

齊邦媛（1997）。中書外譯的回顧與檢討。台灣文學年鑑（頁81-84）。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齊邦媛（1998）。霧漸漸散的時候：臺灣文學五十年。臺北：九歌。

齊邦媛（2004）。一生中的一天：齊邦媛散文集。臺北：爾雅。

齊邦媛（2009）。巨河流。臺北：天下遠見。

蔡易伶（2009）。從後現代思想看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的「翻譯」問題（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北縣。

應鳳凰（1997）。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台灣文學年鑑（頁85-91）。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龍應台（1985）。王禎和走錯了路——評「玫瑰玫瑰我愛你」。龍應台評小說（頁77-82）。臺北市：爾雅。

Bai, L. P. (2009). Patronage as 'a productive network' i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in China.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7(4), 213-225.

Berry, M. (2002, fall). [Review of the book *Rose, rose, I love you*, by Zhen-he Wang].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9(2), 568-572.

Chipman, I. (2007, March 15). [Review of the book *My south seas sleeping beauty*, by Gui-xing Zhang]. *Booklist*, 103(14), 24.

Chi, P. Y. (2000). Foreword. In Li-hung Hsiao (Wu, M., Trans.),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pp. VII-V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ua, C. L. (2012, winter). [Review of the book *Three-legged horse*, by Ch'ing-wen Cheng].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7(1), 139-141.
- Heller, S. (2000, September 8). 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7(2), A22, A24.
- Kinkley, J. C. (2006, Nov/Dec). [Review of the book *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 by Shu-ching Shih]. *World Literature Today*, 80(6), 72.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 Lin, S. I. C. (2001, winter). [Review of the book *Wild kids*, by Ta-chun Chan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5(1), 101.
- Or, Victor. (2005, October 1). [Review of the book *Orphan of Asia*, by Zhuo-liu Wu]. *Library Journal*, 130(16), 70.
- Quan, S.N. (2001, April 15). [Review of the book *Wintry night*, by Qiao Li]. *Library Journal*, 126(7), 132.
- Quan, S.N. (2003, November 1). [Review of the book *Retribution: The Jiling chronicles*, by Yung-p'ing Li]. *Library Journal*, 128(18), 124.
- Quan, S.N. (2005, August 15). [Review of the book *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 by Shu-Ching Shih]. *Library Journal*, 130(13), 71.
- Sciban, S.N. (2003, spring). [Review of the book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by Li-hung Hsiao].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0(1), 181-185.
- Shi, N. A. (1948). *All men are brothers (Shui Hu Chuan 水滸傳)*. (Buck, P. S., Trans.). Taipei: Heritage Press.
- Simpson, A. (2007).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Wang, C. H. (1984/1998). Translator's preface. *Rose, rose, I love you*. (Goldblatt, H., Trans.) (pp. vii-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i, J. M. (2006). Language choice and ideology in multicultural Taiw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1), 87-107.

Williams, P. F. C. (2000, summer). [Review of the book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by Li-hung Hsiao].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4(3), 580.

Zaleski, J., & Steinberg, S. (2001, February 5). [Review of the book *Wintry night*, by Qiao Li]. *Publishers Weekly*, 248(6), 66.